



银行家

程乃珊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银行家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程乃珊 著

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银 行 家

程 乃 珊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4插页 280千字
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

ISBN 7-224-01950-X/1·457

定 价：7.35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蓝屋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望尽天涯路》，程乃珊的一支笔，写尽“上海滩”的众生相。小说集《银行家》亦是如此，汇总了她近年来以“上海滩”为表现对象的中短篇力作。《签证》《银行家》在国内获奖，《洪太太》、《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》、《山清水净》译成英文，在海外颇具影响。作者以一无矫饰的笔触，向你道出《茫茫人海》中一个个《不足挂齿的故事》，讲述《一个古老的小镇上，有一个姑娘……》，巧妙地把对传统道德的缅怀和对新生力量元素的感奋揉合在一起。淡淡的温馨，淡淡的怅惘，如丝丝春雨，苏解着“烦恼人生”中的忆踪与思虑；而淡淡中透出的浓重与沧桑感，亦让你在共鸣中得到一个宣泄的酣畅……

我与上海滩(代序)

始终不明白，为啥上海人总称上海为“上海滩”。我想这里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因素外，也有些感情色彩。“上海滩”是上海的小名，相反“上海市”或“上海港”就是上海的学名、正名。而“上海滩”是不登正式场合和学术文件之大雅之堂的。此外，“上海滩”，颇有一股自上而下俯视上海的自负和自信之慨。我以为，那种意欲征服上海的有志之士，就是以此表示：啥了不得，不过是滩罢了。以此自勉自强，发奋努力。此外，称上海为“上海滩”，多少带点上海本地人的谦和的美德。一般称上海为“大上海”的，则往往是上海的过客、游客或外地人士。

我的祖父从15岁起就从浙江桐乡只身一人到上海来学生意，也是直到那时，他才懂得早上起来要有刷牙这回

事。上海成为他接触现代文明的启蒙老师。十分遗憾，上帝无法让人们在一式一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，因此我所说的所想所写的，脱离不了我的文化背景，但愿读者不要误以为我在炫耀。

我承认，我自小佩服我的祖父程慕灏先生。他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，因家贫，实在供不起他求学了。但最后，他却成为一个中英文谙熟，在外滩中国银行大厦的基石上（可惜已毁于“文革”）刻有他名字的、中国著名的一位银行家。他在这条充满艰辛的路上跋涉时，是以一个凡人的形象出现的，机遇加上他天资聪颖再加上勤奋刻苦，终于使他成功了。5年前，中国银行为他举行了“程慕灏先生服务中国银行70周年”的纪念活动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爷爷是个慈祥的老者。我们家奉行的绝对是“重女轻男”。女孩子怎么着都没关系，爷爷对女孩已到了溺爱的地步，即如我们家第三代都已步入中年了，但每逢与爷爷久别重逢，他还像对小女孩一样亲吻我们。要不是近年来他已体力不支，他还会要求我们坐在他膝头上呢。男孩子们对此不公平待遇早就发过“不平之声”，爷爷却自有他的道理：爱男女孩子的方式应当不一样。一个宠坏了的女人问题不大，一个宠坏了的男人，他一世就全毁了。自然我不能用“妇女半边天”去要求爷爷，但爷爷自有他的理论根据。他以为社会是困苦艰难的，因此需要刻苦耐劳的品格去应付。他自己就是很早就脱离了温馨的父母之爱的保护，开始在社会上跌打的。在他二十二三岁时，已携带巨款一亿日元东渡日本，代表银行去交涉筹备建立第一个海外支行这样重大的事宜。他29岁时，已坐上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这把交椅了。在上海沦陷时期，他身处困境，含辛茹苦地维持着中行的业务。有时，免不了与日本人周旋敷衍一下，为此也受了不少夹档气和委屈，但

八年抗战中的上海中国银行业务就在祖父的主持下，非但没有瘫痪，反而振兴发达了。在外滩矗起一幢新的银行大厦，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大厦。“八百孤军”坚守四行仓库时，是祖父与谢晋元将军电话联系，冒着枪林弹雨去老闸桥中行仓库南门实地视察后，通知看仓库的工友开启仓库门，让谢晋元部队得以进入安全地带。解放前夕，他保护过中行的中共地下党员，协助他们在敌人追捕下逃离上海，并动员帮助他一好朋友、海外中行分行经理，识大体、顾大局，带领全行员工在海外宣布起义，归属北京中行总行。为啥我要费这么多笔墨写我祖父？我以为，他的一生，本身就反映了上海近代史的一个侧面。虽然他一生充满传奇，但他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镜头，都普通得让人忽视，又普通得发人深思。

在他80岁以前，他上街，如不带着祖母，他总是挤电车而不舍得叫出租车。就是乘电车，他也要认真核实一下站牌，如果相差一站路要四分票买七分的，他就宁可走一站了。如果要置一样物件，他会连同价目加利钱一起算的。所以结果，往往是不买为多。有人称此为小农经济意识，我也表示同意。因为不少上海前辈实业家，都是来自农村，免不了有小农经济意识，但就办实业来讲，现今那些大学毕业的、没有小农经济意识的新一代企业家，未必做得过他们。上海滩毕竟是上海滩，小农经济意识还是势力相当强，太先进、太尖锐的观念，如不随乡入俗，在上海滩有时还说不定吃得开呢。随乡入俗，是上海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。西菜进入上海，很受上海人欢迎，因为上海的厨师特地按上海人口味略略改造了一下西菜。后来我去美国，吃了真正的西菜，方知正宗西菜完全是另一回事，远没有上海菜可口。上海的两用衫，一度在服饰单调的岁月中，为我

们女性带来希望的福音，它在衣领、袋口、袖子上吸收了女西服的特点，但总体符合上海的气候，无论政治气候还是自然气候，既可在里面多穿几件毛衣御寒，又可遮盖不可显露的女性曲线。由于袖子和钮扣的排列，还可以变变花样、使它又多少带有一点时装的味道。我以为，即使两用衫，也是上海文化，或者我们讲的“海派”文化的一种表现。“海派”文化，我以为就是西洋文化加中国传统文化（自然也包括小农经济意识）而形成的、一种随乡入俗的文化形式。

我的曾祖父母靠养蚕和在杭州张公馆打杂过活，但他的两个儿子，都成为上海近代史上的名人。我伯祖程慕颢是医学博士，是上海第一个经办医药化验业务的中国人，打破了上海医药化验长期由外国人垄断的局面。鲁迅先生在《死》一文中，也提到过他。他是上海医药界的名士，众多的上海名医都是他的好友。

可以讲，他们已经征服了上海。桐乡少了两个农民，但上海近代史上，多了两个成功者；上海滩，多了两个名人。

自然，上海滩上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成功者。我有一位舅公，是我祖母的弟弟、祖父的内弟，应当说关系还是很近的。我从未见过他。但近来，他经常出现在我思绪中。据说他也是一表人材，只是后来染上了抽鸦片的恶疾，将家产也抽光了，饭碗也敲脱了，家人几次送他去戒烟，苦口婆心劝他，都无效。他自己的妻子最后在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之中，对他绝望了，将他赶出了家门。从此，他沦落街头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叫化子。我祖父几次将他接到家中好言劝解他，再替他介绍新的职业，但他总归好不过三日，又旧疾重犯，终于让所有人都对他冷了心。他又与乞丐为伍了，常乞讨到我家，给了他钱他则不吃白饭

吃黑饭（鸦片），最后饥寒交迫、倒毙街头。就这样，他让上海滩吞噬了，连骨头也不剩一根。不容易的是，他的妻子、即我的舅婆、在丈夫堕落后，自强自立，又出去读书，后来成为一名化验师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当我写下这些时，我总觉得，难道，这不就是上海的脉息吗？虽然那是过去的事了，但我还是那么清晰、强烈地感觉到它，从而引起阵阵的共鸣与浮想。

祖父、伯祖的奋斗和努力，自然对他们下一代造福非浅，带着我们跨入“上等人家”的行列。不过据我所知，那种“上等”，不过意味着他们可以有上等的社会关系和第一流的教育，但生活上决不奢侈挥霍。听我父亲讲、他未成年时的长衫，一直是“三色冰淇淋”。因为小孩子易长身体，因此衣服总是做得又长又大，但太长了行动不便，便在当中腰头折叠起来，然后再一点点随着身长放出来，而颜色，也就因不同程度的洗晒而有了深浅。中国的教育方针是：未成年的孩子，不能过得太舒服。我的父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方针下成长的。

《蓝屋》里的顾鸿飞，一度是读者争论十分激烈的对象，其焦点在于他该不该回蓝屋，该不该接受遗产。不少青年读者，认为此人物不真实。其实，生活中确有此人，我不过做了些艺术润色。他是我父执辈的缩影。

我父亲是4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理工科毕业生，常有他的老同学来聚谈。从他们身上，就能找到顾鸿飞的影子；自负自爱，争气不争财，对洋人洋物，都有他们自己适当客观的见解。他们至今看不得日本人，讨厌外币券和对外国人的种种特权。虽然他们连芝麻绿豆官都轮不上，但严以律己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混病假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很有可能这工作并不是他们自己所中意的。今天，虽然录像机、高级音响乃至

自费留学观光，都成为时尚诱人的事物，但他们是死也不肯向自己海外亲兄弟姐妹开口的，自然更不会开口向他们调兑外汇或兑换券。他们认为，这是十分浅薄而失礼的举止。他们虽则学理工科，但古文根底好，英文程度满可以应付一般的信函及阅读会话。虽然他们自中学起便就读于教会学校，但至少像我父亲，却不会跳华尔兹。虽喜欢平·克劳斯贝，但也喜欢评弹说书，业余摆弄盆景，爱读《红楼梦》及一些古典笔记小说。他们将家庭子女看得十分重，子女如不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他们会引为终身憾事。我家一位亲戚，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，从法国辗转取道日本回到上海来（当时中法尚未建交），为了与他1947年赴法留学时分手的未婚妻完婚，然后与我们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因为他当时是以一位旅行者身分入境的，所以他抛弃了国外的优厚生活条件，随身只拎着一只装着替换衣物的皮箱，根本没八大件几小件！

我就是从他们身上把准了顾鸿飞的基调。我觉得无需讨论顾鸿飞该不该回蓝屋，下一代人无法代替上一代人生活和思考。两代人之间很难相比而作出谁更好谁不够的结论，你没法在两代人之间区分好与坏。

写到上海的知识分子，总要想到“制造”出这些知识分子的院校。上海的沪江、圣约翰、交通、同济大学等，不可忽视他们对上海市民文化结构的影响。

中西女中，即现在的市三女中，多次在我小说中出现。对于它的功过，我们暂且不谈，但上海解放初期的知识女性，来自中西女中的占相当大的比例。她们中，大半后来都在上海英语教育界服务。可能因为我的母亲、婆婆、姑妈等都是来自中西，因此我对这所学校十分感兴趣。我们的母亲们，在这里受

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势必因此也影响我们。白先勇的小说中，也多处提到中西，足以说明，中西女中对上海市民的文化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为啥我们上海本身，不去作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呢？宋家三姐妹、孙中山的孙女、钱学森的夫人、荣氏家族的后人、著名的已故钢琴家顾圣婴、女导演黄蜀芹、前任上海市妇联主任谭茆芸……都来自中西女中。我曾拜访过原中西校长薛正先生，我发现，早年的中西治学方针，剔除其为少数有产阶级服务的宗旨，其他各方面十分值得我们当今的教育界借鉴：他们针对女中特点，在高中就开设常见小儿病防治课、婴儿护理、优生学和计划生育，烹饪和治家、礼仪等，这些对一个必将成为母亲的女孩子，难道不是必修课程吗？而当年这些中西毕业生，她们步入社会后的命运，生活本身证明，也是各不相同的，白先勇已表现过她们了，胡考的《上海滩》也涉及过，我也多次描述过。文学来自生活一点不假，生活本身就提供了我们写作所需要的、以一当十的细节。一次偶然的会，我听妈妈的一位同学感叹着：“‘文革’中，我在马路上碰到中西的同学只当作没看见。因为中西出来的，不论她本身还是她的家庭，总归是有问题的，免得麻烦、套上黑串联的罪名。”她这番感叹触动了我，要将笔端深入到这所贵族女中去。我们不是常说，小说要有一种命运感吗？而生活本身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们的经历、生活，难道不就表现出命运本身的沉浮和不可捉摸吗？于是，我写了《喷泉里的三枚银币》，还有《女儿经》里的沈家姆妈。令我安慰的是，在中西女中同学会上，许多妈妈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学校友，要妈妈转告我，多写一点她们，多为她们讲几句话。

拉拉杂杂写了这么些与我无关的人和事，无非是希望读者

了解一下我的文化背景，原谅我不能写出我力所不能胜任的人和事。但我相信，就我的立足点深挖下去，我会奉献给读者更深刻更动人的文字的。

上海的魅力，犹如一位美女的天生丽质，是遮掩不掉的。即使在“左”的思潮十分得势的年月，上海人、至少是我，总有办法在可能的范围内，为自己的文化增加一点色泽。

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，是晚饭后拉上窗帘、让爸爸放上几张·克劳斯贝或麦克唐娜的唱片、再加上手持一杯香喷喷的煮咖啡，注意，不是速溶的，当时我简直是从心里唱出：“甜蜜的家”了。虽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，但他们听交响乐的欣赏水平不够，故我的音乐修养也只能停在轻音乐水平上。我青少年时的晚上，多数是这样度过的。一道弹簧锁就可以把一切不如意关在门外。真好！长大一点了，我就和同学们结伴看电影，看画展。上海毕竟是上海，不少第一流的国际艺术团总是在上海演出的。60年代初的这种票子还是可以个人购买的，记得1965年一次法国芭蕾舞团访问演出，买票人把圣歌琴行的玻璃都挤碎了，我有幸也弄到一张票，与好朋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如痴如迷的晚上。1964年，在上海美术展览馆有一次英国水彩画展览。我正在念高三，和同学们逃了次自修课，却抓住了这次机会，欣赏到一幅今日依旧记忆犹新的“瑞士长日”。高中二年级时，正值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在比利时获奖后开独奏音乐会，当时八角一张的门票是十分昂贵了，特别对我们学生来讲。好在父母在这方面花钱永远是慷慨的，从来不让我失望。音乐会在美琪电影院举行。年轻的钢琴家顾圣婴，在我心目中一点也不神秘超人，一曲肖邦的夜曲，使我感觉她与我如此贴近，但她那么年轻就成名了。我想，我也要努力。我喜欢她，

是先喜欢她的名字，再喜欢上她的演奏风格：含而不露，带着几丝淡淡的哀怨。是她，让我再也不视钢琴演奏为高深的艺术了。音乐会结束后，同学们都讲我像顾圣婴，虽则她不算漂亮，但我还是很得意了一阵。上海的舞台艺术是那样丰富，使我有幸赶在“文革”前，就欣赏过中央歌剧院来沪演出的《货郎与小姐》及《茶花女》，中央芭蕾舞团的《天鹅湖》及《圣母院》。一个19岁的学生有这样的眼福是很可以的了。这些使我心灵中有了个类似驼峰的功能，在长达十年的文化饥渴中，我们几个好朋友不时仗着它来回忆一下，以坚信美的魅力，勉励自己不跌倒、不堕落、不灰心。同时大家都感到，我们的青春还有不少值得怀念的东西，我们享受过了。

真的，什么样的脑子我们没动过？“文革”前，西方画报杂志是绝对不能进口。但上海毕竟是个大城市，出出进进的人总归有的，因此总也能弄到我们喜欢的时装画报，如美国的《Vogue》、日本的《贵妇人》等。然后我们就各取所需，参照上面的领子、扣子式样，尽量制出与众不同的服饰，又用废电线卷出我们喜爱的发式。

上海，还可以说是个名人荟萃的城市。西方谚语说，如果在巴黎街头上空掉下一块砖石，就有可能砸中一个艺术家。我想在上海街头，千万别小看那些衣着朴素落伍的行人，他们中，或许就有不少是有点来历的。

抄家之时，我家扫地出门至一诸姓住户的楼上。不久我即发现这位貌不惊人的诸老先生出言不俗，他果真是有点来历的，可谓上海会计的泰斗之一。抄家时他置金银财宝于不顾，却硬是把一套文史资料丛书藏匿下来了。“文革”十年，我们两家风雨同舟。我与他，也结成忘年之交。他诙谐幽默，颇能

苦中作乐。他的处世为人让我学到许多人世真谛。他十分信任我。对我，他的书橱是洞开的。十年中，我浏览遍他所存的藏书，颇体会到雪夜闭门读禁书之乐，并经常得以聆听一些有关上海金融股票生意的趣闻。他就是民革常委、赫赫有名的诸尚一先生。后来我们家落实政策搬回原住房，我颇感依依不舍。

还有一女邻居，七十来岁，秋天扎头巾，戴口罩，经常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夏天，也永远穿那种落伍的老式衣衫，只是她的五官却依旧清秀。不过这样的老嫗在现今社会上，一定会遇售票员的白眼，时髦姑娘的冷眼。我偶然发现这位老太太讲得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，一次随便与她聊聊，方知道她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空中小姐之一。当年从沪江大学毕业后，以一千人取七人的优异成绩，考进民航任空中小姐，别看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老太太，讲起飞机型号可如数家珍，稔熟得不得了。前不久放过一部有关民航起义的电视片，她竟能对我一一指出其不真实或不足之处。顺着她的思路，我笔下又多了个人物，小说中又新增了一个角色，很幸运，我不是从采访，而是从生活中，认识了一些上海现代史中的人物或他们的后代亲人。如沪江大学校长夫人杨女士、顾维钧的小姨；当年护送斯诺去解放区的于牧师的女儿；老牧师、老企业家……他们本身就是一部近代史，我视他们为前辈、老师、教科书，他们都是我笔下新人物诞生的源泉和基础，是上海这块土地上特有的人物。缺少他们、上海就不成其为上海。

或许有人奇怪，为何要费那么多精力去了解那些老古董？为啥不写写今日的海人？今日的海人当然要写，而且要占主角。但今日的海人不是从石头缝中爆出来的，每个人的个性、气质、格调，都与他所处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只有正

确、全面、客观地了解了上海的历史，才有可能在笔下塑造出有血有肉、不偏不倚、令人信服的今日上海人和上海滩。

十分幸运，我在教育学院毕业后，分配到杨浦区一个棚户集中之处任中学教师。在那里，我接触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和人物，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几年，十分感谢这段时间生活的赐予，使我写出了《穷街》、《不足挂齿的故事》、《五彩缤纷》等小说。它们使我对上海有了一种立体的了解。芸芸众生，就是这样艰难又平凡地生活着，近代史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分明又是近代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。而且，每隔一段时期。他们中就会产生出一颗耀眼的星星——社会名人。大多社会名人，其实都是来自平民阶层。

而一位来自平民阶层的成功者，其中的故事，他的生态心态，又是十分丰富复杂，悲喜交集，一言难尽的。扑朔迷离的上海滩，她的魅力，就在于不同的人，都能谈出自己为上海人所认同的不同的感受。她绝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，或许，谁也无法将她一眼看到底。

目 录

我与上海滩（代序）	（1）
洪太太	（1）
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	（10）
山青青水粼粼	（20）
茫茫人海	（47）
不足挂齿的故事	（79）
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，有一个姑娘	（102）
签证	（120）
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	（254）
银行家	（318）

洪太太

大家都称她为洪太太。50年前，“洪太太”这个称呼，红透了上海的社交圈，谁家孩子办汤饼会满月酒，婚嫁喜筵或生日聚会里，要没有洪太太在席，那就算不上是一席尽善至美的筵宴；1949年以后，一度“洪太太”三个字有点像是从樟木箱里翻抖出来，散发着阵阵呛人的樟脑丸味；不过在一定范围内，比如上海几户有数的大户之间，还是很有能量的，一直到60年代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止，在上海自有一个快乐的圈子，不管外面刮风下雨，只要你饭吃三碗，闲事不管，仗着政府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，笃定可以今天吃国际饭店，明天吃“红房子”、“玉佛寺”，不会有人干涉你的。那时节洪太太是最活络的，各大酒楼宾馆的公私方经理都与她相熟，且她天性热心，办个